

# 李贵:为人正派求真务实的好干部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③

李贵,汉族,1915年出生,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人。

李贵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他在临河一校上学期间,参加了学潮,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李贵一直以乡村小学教员的身份在临河进行抗日活动。他和侯野峰等人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民众教育馆“校友会”,积极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刘进仁通过关系把李贵从杨柜小学调到临河一校担任教师,并介绍他和侯野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临河知识分子支部。从此,临河县一校成为河套地区宣传抗日的阵地。

1939年,李贵来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担任陕北公学学生会副主任。1942年,他调到西北公学担任教务处指导员,后来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李贵回到绥远地区,历任绥蒙情报处绥南情报站站长、绥蒙训练队第八队指导员、绥蒙公

安局情报科副科长、包头市公安局副局长、绥远省公安厅科长。1949年5月,中共华北局和国民党绥远当局签署了《绥远协议》。7月底,李贵跟随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远省联络处进驻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落实《绥远协议》的各个事项,他主要负责安全保卫方面的工作。

1949年9月,绥远和平解放后,李贵回到河套地区,担任陕坝地委委员、公安处处长。当时河套地区土匪很多,一些国民党残兵和潜伏特务秘密杀害了许多共产党干部。李贵亲自坐镇,开始了清剿匪特行动,经过一年战斗,在解放军配合下,肃清了河套地区的残匪、特务。老电影《沙漠剿匪记》《虎穴追踪》的故事素材就取自于河套地区的剿匪除特斗争。后来,李贵调到绥远省公安厅,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副厅长。

1957年,李贵调到大兴安岭,担任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局长。当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大兴安岭林区出现了“皆伐”“间伐”两种意见。李贵坚决反对推光头式的“皆伐”,极力主张“间伐”,留下幼树生长,保护大片森林。内蒙古自治区领导乌兰夫和王铎视察林区时,明确表示支持李贵的意见,而且发现他为人正派,踏实能干,求真务实,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领导干部。1963年,李贵担任了内蒙古林业厅副厅长。1965年,乌兰夫根据内蒙古党委组织部的推荐,同意李贵担任呼和浩特市第一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乌兰夫遭到诬陷和迫害,李贵也受到牵连,关进牛棚长达7年之久,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一直被“军事监护”的乌兰夫从长沙回到北京。1972年,李贵也被“解放”。1974年,内蒙古党委任命李贵担任巴盟盟委第一书记,重点抓好粮食生产。李贵到任后,立刻启动了开挖总排干沟的工程,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他和大家冒着刺骨

寒风和漫漫黄沙,靠着一把铁锹和两个肩膀,以惊人的勇气和速度,完成了挖通总排干沟任务,彻底改变了巴盟农业的落后面貌,巴盟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塞外粮仓”。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任命乌兰夫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77年,乌兰夫率领中央代表团回到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专门去了巴盟,看望李贵。当时,乌兰夫正想选一位年富力强的人到中央统战部做自己的助手,他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推荐了李贵。中央接受乌兰夫的建议,任命李贵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乌兰夫主持的中央统战部各项工作如虎添翼,全面展开。

李贵协助乌兰夫做的第一项工作是李维汉平反。中央统战部早在1964年就开始错误地批判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元老人物李维汉。李贵配合乌兰夫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3月,中央统战部上报中共中央批准,首先为李维汉彻底平反,随后为



全国一大批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老同志恢复工作。李贵协助乌兰夫做的第二项工作是全面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赎买政策,通过公私合营让民族工商业走上国营道路。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民族资本家不但受到批斗关押和人身攻击,他们的财产也被查抄没收。1978年,李贵组织人员起草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批准,全部发还民族资本家被抄的物品,对他们的家属子女不唯成份论,在入党、升学、招工等方面不允许再歧视他们。李贵协助乌兰夫做的第三项工作是错划的“右派”

分子摘帽。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运动中,全国50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身自由。乌兰夫责成李贵尽快做好这项工作。1978年,李贵组织人员制定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实施方案》上报中央。中共中央正式发布文件,“右派”分子终于得到了彻底解放。

李贵协助乌兰夫做的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80年,中央决定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李贵按照乌兰夫的指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带领起草小组反复修改,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1984年10月1日颁布施行,不仅完善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为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共同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1994年,李贵光荣离休,2002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呼和浩特市党校供稿)

## 两只老鼠引出的间谍案

1964年10月16日上午,一道道密语电波在罗布泊与北京之间穿梭:

“8点钟,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10点30分,梳完辫子。”

“11点30分,第一次检查完毕,结果正常。”

记录这些密语的是时年29岁的宋炳寰。认真核对相关信息后,他再通过一部专线电话将“老邱”的情况传递出去——接收密报的,是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军事秘书王亚志。

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以至50年后,耄耋之年的宋炳寰回忆起来仍然恍如昨日。

“老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因为这颗原子弹长得像一个巨大的“球”。装原子弹的容器代号“梳妆台”,连接引爆雷管的密密麻麻的电缆线代号“辫子”,原子弹装配代号“穿衣”,原子弹地面装配间代号“下房”,铁塔上的密闭工作间代号“上

房”,气象代号“血压”,原子弹起爆时间代号“零时”。

“零时”定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00分——这一信息非常保密,甚至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也是在起爆前1小时才得知这一消息的。

有人疑惑:有这个必

要吗?答案是肯定的。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在我国西北周边建立了多个监听站和测向站,不断利用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刺探我国的核试验情报。在我国相继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之后,相关的间谍活动也从未停止。



1967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海关进出境检查部门发现一名外国人的托运物品中有两只老鼠。

这名外国人名叫乔治·瓦特,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外交部前不久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同时也批准他离境到香港度假。而这两只老鼠据说是乔治·瓦特喂养的宠物。

消息传到北京,迅速引起了公安部门负责敌特侦查人员的警觉。事有蹊跷!他们立刻通知海关将这两只老鼠悄悄扣下。为避免打草惊蛇,还专门捉了两只相同的广州老鼠交给对方。

经检测发现,两只老鼠身上均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的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

的放射性数据相近——老鼠很可能就来自核工业基地!

随后,北京的办案人员又在首都机场从瓦特夫人行李中搜出了发报机和微缩胶卷,胶卷里正是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以及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

真相大白——瓦特的表面身份是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却是研究放射化学的专家。他携带两只老鼠出境,目的就是测试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核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以推算中国核工业发展机密。

这起案件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案件侦破工作顺利进行,公安机关通过瓦特这条线索,又挖出了其他潜藏在西北地区的美国情报人员。

谍战疑云,始终与中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相伴相生。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周恩来,在涉及原子弹试验

的工作上更是思虑周全,从一则史料中可见一斑: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1964年9月16日),周恩来组织召开中央会议,专题研究原子弹试验相关问题。

开会期间,张爱萍因为有外事活动要去会见外宾,需要中途离会。周恩来马上说,告诉外交部,今后张爱萍(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总指挥)和刘西尧(我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副总指挥)都不参加外交活动了。张爱萍起身要走时,总理又专门让他摸摸兜里有没有纸,有没有记的东西,有记的东西马上掏出来。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核试验要严格保密,并要求相关人员当晚就规定出一些暗语、密码,核试验现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系,一律通过密语传递信息。

这才有了上文提到的“老邱”“梳辫子”“零时”等代号。(据《文史博览》)